

当前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 调整的互动机制研究

张 杰 杨连星

内容提要 当前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需要通过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来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动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财政政策仍然是调结构的主要手段。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中国财政政策调整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和影响,财政困境的新常态将极大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空间。基于此,必须利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通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率。而要加大结构调整与改革力度,就需要对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内在关系的重新定位,通过财政政策发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对中国既有的财政政策框架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 政府干预 市场主导 财政困境 经济新常态

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00872

杨连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100872

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国内经济条件和外部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面临有利条件和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以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通过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来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解决中国增长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与突破口所在。鉴于多重目标下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财政政策需求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本文在分析财政困境将对调结构战略目标造成制约效应基础上,对通过全面的改革与创新中国既有的财政政策,进而利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提出了全面市场化改革的针对性优化途径。

一、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应逐步由政策主导向市场主导全面转变

1. 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

2014年以来,随着GDP增速下降到7时代,中国经济进入了以“调结构”为核心目标的重要转折时期,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关键拐点期和结构调整的最艰难期这“新三期叠加”效应的重要时期。

第一,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长期不恰当的过度干预,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表象是外需或内需不足,实质上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滑是由于经济供给方面出现重大问题。以往中国的经济放缓是外生性的,与外部出口市场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其下滑原因可以从需求角度来理解,即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等外部需求出现反弹和复苏,经济就会自动恢复增长。然而,当前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已经具有了内生性特征,与政府过度以及不合理干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密切相关,即需要从供给角度来理解。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中国部分出口产品特别是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品,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正在逐步下滑,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优势进一步弱化。

从供给方面来看,通过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是较为合理的长期目标。然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短期内保就业、稳就业的内在需求迫使政府采取一定的稳增长政策。如果延续以往惯用的刺激需求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政策目标,但这种促进效应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往往会加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和金融风险的扩散。事实上,当前比较稳妥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采取不会对微观经济部门造成重大扭曲效应且具有公共性质的微刺激计划,比如高铁地铁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水利设施改造、棚户区改造等供给侧面政策,同时实现保就业、稳就业的“保下限”核心目标。此外,要全面实施以消除金融压制、削减税费、减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和消除垄断管制等一系列供给改革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竞争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

第二,政府干预造成的金融压制体制,导致了供给层面的产业结构扭曲,使得产能过剩和收入结构扭曲等现象并存。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稳妥的改革,已经成为突破利益集团对改革阻碍效应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持续发展能力弱化的核心障碍因素之一,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首先,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呈现显著的“掠夺效应”,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存量,但是金融资源的方向错配、结构错配以及功能错配,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特别是在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其次,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急剧扩张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核心因素,是上述五大现象最为关键的联结者。再次,中国的金融压制体制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关联和冲突矛盾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利益集团依靠对金融体系支配权力的控制或干预,通过寻租活动来谋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自身也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利益相关者谋求私利的重要领域,其中寻租活动带来的各种腐败现象,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中国现行的金融压制体制对各种金融风险的积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可能引发下一轮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第三,政府和市场权利边界的界定不清,形成国有经济部门长期垄断型特征和权力腐败,助推企业交易成本,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当前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国有企业的正常功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或者异化,成为企业获取行政性垄断权力和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通道,以及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延伸和权力寻租的重要载体。这具体表现在:(1)针对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和“去行政化”为目标的多轮改革刺激下,国有企业出现了由产业链下游的竞争行业向产业链上游的自然垄断行业环节转移的趋势。表面上来看,这种转移趋势是似乎由国有企业的公共性质以及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所驱动,实际上这种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由已经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延伸和权力寻租所驱动的,自然垄断背后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行政垄断的力量和动机,这显然对国有企业的功能造成了扭曲和异化。(2)中国现行的官僚体系本质上是以行政层级为主体的载体机制,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的行政化就是这种官僚体系的延伸。这一方面,导致了国有企业多轮改革措施

并未起到应有成效,相反,国有企业的行政化体制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超额收益激励下得到固化。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企业的超额收益对各级政府官员的利益所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造成了政府官员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到国有企业担任重要管理人员,从而获取更高的薪金收入,催生和固化了中国各级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现阶段政府行政政策主导与政府过度干预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微观层面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均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对政府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实施大改革、大突破。

现阶段,中国各级政府行政政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微观层面的创新创业活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抑制效应,突出表现在:(1)在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掌控企业部分关键要素审批权以及特殊产品市场控制权的情形下,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相当比例企业需通过与各级官员进行合谋与寻租来谋求低成本的关键要素以及额外的竞争资源,对权力寻租“垄断势力”的造成依赖,极大削弱了这些企业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目前,不少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得“垄断势力”。(2)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资产泡沫化现象逐步凸显,创业创新动力受到突出性抑制。近年来,中国众多制造业企业竞相将自身的利润、销售收入甚至银行贷款投向了房地产,而非投向企业的创新研发、品牌建设等核心环节。过去10年内,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的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如此巨大的利润距,必然刺激诱使资本流出制造业部门并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从而加剧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弱化,经济“空心化”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3)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面临过高的税负水平、社会交易成本以及融资成本。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着政府对关键要素市场的控制以及企业重点交易环节的权力干预,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情形下,从企业各种要素采购到组织生产再到流通运输环节,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以及官员寻租活动,从根本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研发能力的投资。

2. 通过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来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解决中国增长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与突破口所在

对于中国当前的各种结构扭曲,通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可能会使得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止跌回升,进而重新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虽然按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定义,是既有经济资源和要素均得到充分利用条件下的经济最优增长水平。然而,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转型背景的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实现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约束条件未必是由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最优水平决定,可能是由经济发展阶段中某个特定或关键性的资源和要素所具有的“短板”性质来决定的,或者说,某个特定或关键性的资源和要素发挥作用需要特定的外部环境来推进,而这个外部环境可能具有“短板”性质的制约作用。一旦这个具有“短板”性质的特定或关键性的资源和要素,被通过改革或创新培育出来,那么,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有可能得到重新释放和提升。因此,这些制约性的因素一旦消除,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出现上升或者下降趋势收窄的态势,即通过全面的综合改革,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20年可能还将维持在7-8%左右的中高位水平。

3. 中国经济新常态所呼唤的大创业、大创新格局,迫切需要由当前政策主导型向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思路的大调整、大突破

中国正处于通过全面市场化改革营造全社会“大创新、大创业”氛围,激发企业构建“创新红利”的关键机遇期。根据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现状,中国经济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2013年达到257.7万件,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阈值。2014年支出占比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其出口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

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根据我国现有的创新发展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产业过渡,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因此,中国正处于通过全面市场化改革打造“大创业、大人才”格局,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机遇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化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每年高达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说明中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时期,大规模高等教育的群体为中国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因此,通过市场化改革,能够实现从“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向“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过渡。

4. 应高度警惕中国的结构调整可能进入政府政策干预偏好的路径依赖陷阱

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可能进入一种政府政策干预偏好的路径依赖陷阱。首先,当前形成的政府政策干预主导型发展模式,是由现阶段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制以及特定的财政分权体系关系所内生决定的,只要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制关系未能进行突破性改革和调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其次,政府政策干预主导型发展模式演出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这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全面转变形成了不可低估的巨大阻力:一方面,各种寻租机会导致地方官员为获取私利而对政府政策主导发展模式的特殊偏好与依赖;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不少国有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与掌握特定要素分配权力的官员的合谋,来获取企业盈利空间乃至超额利润的发展模式的依赖。最后,中国各级政府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型思维模式以及发展经济能力的固化状态,使得发展思维固定模式以及“懒政、怠政、怕政”与“为官不为”等行为普遍存在,可能对市场主导型调控模式的转型造成不可忽略的阻碍效应。

二、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中国财政政策调整需求差异性的比较分析

1.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仍然是调结构的主要手段

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条件下,财政政策仍然是调结构的主要手段,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第一,在当前中国仍处于界定和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力边界的进程中,在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尚未形成之前,仍需财政政策来缓解、消除、转化各种体制性障碍和利益集团;第二,中国仍是追赶型和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升级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格局的形成,均需要通过适度和合理的财政政策支持与引导;第三,中国的“调结构”的战略目标能否最终顺利实现,与当前“稳增长、保就业”的基本任务密切相关。2015年是维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关系的关键年份。在中国经济当前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形下,短期内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的内在矛盾已经凸现。这种情形下,需求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稳增长、保就业”基本任务的推进,从而为“调结构”战略目标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2. 多重宏观调控目标下不同经济结构调整模式对财政支出需求差异的分析

第一,政策主导型调结构模式情景下对财政支出需求中,“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促民生”宏观调控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促创新”、“促创业”、“保就业”宏观调控目标会造成财政支出的一定程度增加。而对于市场主导

多重目标下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财政政策需求的差异性分析

	政策主导型结构调整模式	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模式
多重经济发展目标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
调结构	大幅度增加	减少
稳增长	大幅度增加	先较大幅度增加后逐步减少
保就业	增加	先较大幅度增加后逐步减少
促民生	非常大幅度增加	非常大幅度增加
防风险	大幅度增加	先较大幅度增加后逐步减少
促创新	增加	小幅度增加
促创业	增加	小幅度增加
总量预计	大幅度增加	可能不变或小幅度增加

型调结构模式情景下,“调结构”宏观调控目标会造成财政支出的一定程度减少;“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宏观调控目标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先较大幅度增加后逐步减少;“促民生”宏观调控目标会造成财政支出非常大幅度的增加;“促创新”、“促创业”宏观调控目标会造成财政支出的较大幅度增加。

第二,从多重宏观调控目标中财政支出的需求来看,政策主导型调结构模式下财政支出的总量必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市场主导型财政支出呈现可不变或小幅度增加的特征。从长期来看,市场主导型财政支出可能出现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态势。在现阶段财政收入增速逐步下降的既定事实下,很显然,政策主导型可能会造成财政支出长期大于财政收入的财政困境现象,而市场主导型造成财政收支困境的可能性不大。

三、财政困境将对中国调结构战略目标造成极为重要的制约效应

1. 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与财政支出的不对称效应所导致的财政困境将成为常态

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拐点式下滑的既定态势。这具体表现为:首先,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4349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14035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8.3%。但是,201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了拐点式的下滑态势。2014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8.6%,年度增速创23年来最低。这可能表明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的不对称时代的结束与GDP增速持平拐点的到来,预示着财政收入压力的长期化以及可能面临的财政困境。其次,以“调结构”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企业的全面减税、结构性减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困境风险。

从当前财政支出来看,既面临“稳增长、保就业”的刚性需求压力,也面临“促民生”带来的支出持续加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大创新、大创业”局面形成造成的财政扶持激励资金支出需求的提升,以及“防通缩”、“控风险”蕴含的突发性需求增加大压力。具体来看:首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的“稳增长、保就业”的社会目标,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时,必须通过政府投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加大保障房建设等重大项目,来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其次,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持续提升的各项民生需求以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社会保障政策托底,需在“促民生”方面较大幅度地、持续地增加财政支出;再次,中国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既面临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大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激发全社会创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和支持方式的重大转变,又面临“调结构”的大改革、大调整过程中应对突发性风险的突发性财政支出需求;最后,在中国地方债务规模或超30万亿元的情形下,特别是在相当比例的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收入偿还地方债务的链条可能出现大范围断裂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出现财务困境的风险不可忽略。

2. 现行的政策支配型财政支出思路,进一步阻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首先,中国各级政府惯常使用的以奖励、贷款贴息和无偿资助等财政资金扶持资助形式,来激发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和激励企业专利申请活动的做法,本质上还是体现了政府政策主导的思路和逻辑。事实上,这些政府政策主导型的财政资金扶持,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普遍性的扭曲性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合谋来骗取中央资助企业创新研发的资金,以及企业弄虚作假套取各级政府创新补贴资金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专门和企业勾结合谋骗取政府创新补贴资金的专业化公司。此外,政府政策主导型的创新补贴政策以及新兴产业扶持资金,并不能真正甄别和筛选出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项目和新兴产业,相反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在位创新企业的垄断势力。既阻碍了新的创新企业的兴起,又对在位创新垄断企业的自身研发投入形成了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不利于创新的可持续性以及创新对全社会溢出效应的发挥。

其次,中国各级政府出于促使GDP增长而普遍采用的“促增长、稳增长、保增长”政府补贴扶持资金,是导致中国部分行业普遍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削弱经济结构调整内生动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实上,那些资本投入强度高、能够在官员任期内带来GDP规模快速扩张的、且通常是资源型行业或重化工行业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的青睐。

最后,中国各级政府现行的政策支配型的财政支出思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滋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活动。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以及银行低成本资金支持,客观上造成了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垄断性的、行政性的竞争优势以及特定环节、特定形式的“国进民退”,进而产生对民营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全社会生产效率增长的“拖累效应”,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3. “稳增长”与“调结构”冲突加剧,进一步固化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应

在中国经济当前可能出现通货紧缩风险的情形下,短期内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的内在矛盾已经凸现,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从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关系来看,就是要依靠“精心谋划用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然而,一旦经济持续下行导致通货紧缩真实发生,中国经济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将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导致通过调结构来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失效;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预防或解决通货紧缩难题,可能会倒逼各级政府按照惯性思路,出台以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计划为主的全面抗通缩政策措施。这会进一步加大财政困境发生的概率与风险,进而对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造成干扰效应甚至负向冲击效应,甚至固化和扭曲原有的经济结构。

4. 财政困境的新常态将会极大制约中国调结构的路径选择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仍然延续以往的政府政策主导型调结构的发展与调控思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出现财政困境的概率极大。即便中国的结构调整思路逐步由政府政策主导型的调控思路向市场主导型的调控思路全面转变,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出现财政困境的概率仍然相当大。当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阶段。这就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调控的目标必然是多重性的,既包括“调结构”、“促创业”、“促创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也包括“稳增长”、“保就业”的社会底线管理目标,同时也包括“促民生”的社会发展目标以及“防风险”的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目标。而且,这些多重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相互矛盾和冲突,难以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来加以解决。因此,要高度重视现阶段财政困境的新常态对中国调结构的路径选择空间所造成的影响。

四、财政困境下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思路的突破与重构

当前中国正处在多重矛盾叠加,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特定时期。因此,必须利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通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率。而要加大结构调整与改革力度,就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发力,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对中国既有的财政政策框架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

1. 不同的经济结构调整路径对中国当前财政困境产生的差异性影响

从短期来看,由于中国正处于多重矛盾集中爆发的关键时期,这造成和决定了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中国即便全面推进由政策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调结构思路的转变,短期内并不会缓解可能的财政支出刚性需求导致的财政困境,甚至导致财政支出刚性需求压力加大,加剧财政困境。然而,在实施市场主导型调结构的思路下,由于政府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改革手段和途径,而不是再依赖大范围财政资金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长期来看,“调结构”方面的刚性财政支出将呈现逐步下降的基本态势,这将从根本上逐步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当前发展模式下财政困境的难题。此外,需要着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市场主导型的调结构思路所蕴含的大改革、大调整格局,很

有可能短期内会造成经济和社会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很有可能就使得“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的宏观调控目标下财政支出刚性需求的短时间内急剧加大。但是,这种短期财政支出增长,必将伴随中国全面的改革而逐步减少。此外,市场主导型调结构发展模式节约出来的财政支出,将会转移到“促民生”以及“促创新、促创业”方面,从而在中国财政收入小幅度增长的新常态条件下,实现多重宏观调控目标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长期平衡。

2. 多重约束目标与财政困境双重背景下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内在关系的重新定位

现阶段在多重约束目标和财政困境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的定位应全面转向“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的有机平衡。重点放在“调结构”方面,兼顾“稳增长”和“保就业”的社会托底政策要求。一方面,“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是相互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稳增长”是 2015 年及以后的短期战略目标,是通过全面推进“调结构”来对既有扭曲的经济结构实施全面改革,而不是重复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以及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实施的经济刺激增长模式。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调结构”是实现“稳增长”的核心手段和方式,也是建立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对经济结构中各种扭曲性因素的消除,激发市场机制活力,重塑和壮大经济潜在增长的内生动力。

3. 市场主导型的经济结构调整思路是破解中国中长期财政困境的最优路径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面临具有矛盾和冲突的多重宏观调控目标以及可能出现的财政困境的双重压力,如何协调解决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利用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而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内生动力,关键在于从根本上理解和推进以市场主导型调结构为主改革的重要性,这对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不可替代价值。事实上,全面推进以市场主导型调结构改革思路,不仅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架构,也是促进财政体系调整与重构的重要基石,更是科学破解中国中长期财政困境的最优路径。

参考文献

1. 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成都〕《经济学家》2014 年第 2 期。
2. 贾俊雪、郭庆旺:《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北京〕《世界经济》2012 年第 11 期。
3. 郭晔、赖章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比较》,〔成都〕《经济学家》2010 年第 5 期。
4. 郭庆旺、贾俊雪:《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
5. 编辑部:《砥砺前行中的世界经济:新常态、新动力、新趋势——2015 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 期。
6. 吴化斌等:《消息冲击下的财政政策及其宏观影响》,〔北京〕《管理世界》2011 年第 9 期。
7. 刘贵生、高士成:《我国财政支出调控效果的实证分析——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分析的视角》,〔北京〕《金融研究》2013 年第 3 期。
8. 许宪春、王宝滨、徐雄飞:《中国的投资增长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北京〕《管理世界》2013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天 则〕